
王尔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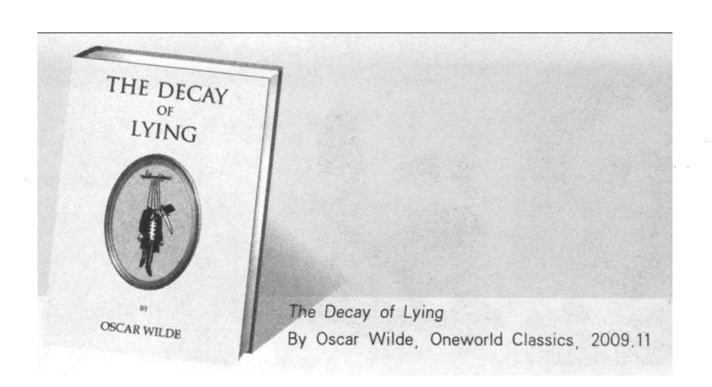
与王尔德的文字缘

张隆溪

读者和所读的作品之间有一种互动，有时候由于特殊的环境和心境，读到一部好作品会有格外深刻的体会和感受。记得初读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的作品，情形就是如此。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正是“文革”那万马齐喑的年代，不记得在哪里偶然找到王尔德一篇妙语如珠的论文，题为《谎言的衰朽》。当时所读为中译本，已不记得译者是谁，但王尔德那语惊四座、充满机锋和睿智的议论，立即深深地吸引了我。在那个年代，官方正统宣传的是文艺反映生活，文艺为政治服务，表面上注重现实主义，实际上谁都看得出那些虚假的样板戏和夸张做作的英雄形象没有什么生活的真实。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年代，压倒一切的主题是阶级斗争，不讲温情，美更几乎成了一个贬义词。对那些既没有说服力、又十分压抑人的说教，我实在打心底里反感。就在这时候读到王尔德的《谎言的衰朽》，听他一反众说，宣称不是艺术模仿生活，倒是生活更常模仿艺术，艺术并不反映现实，而是一种虚构，王尔德故意称之为谎言，并解释说：“谎言，即讲述美而不真的事物，才是艺术正当的目的。”在“文革”压抑的政治氛围中读到这样的话，那种痛快淋漓的新鲜感和惊喜实在难以形之于言。

王尔德善于以机灵、俏皮的语言说反话，而言谈又往往含有深意，耐人寻味。他所谓生活模仿艺术，其实就是说艺术家能赋予我们崭新的眼光，教会我们去认识生活中的美。他说：“如果不是先有印象派画家的作品，我们哪里会有那种在街头低迴飘摇的褐色浓雾，使煤气灯的灯光若隐若现，把一家家住房变得像幽暗的鬼影呢？如果不是由于印象派及其大师，我们又怎么会有横在河面上那可爱的一层银色薄雾，把弯弯的小桥和水中荡漾的船只都化为优雅的、渐远渐淡的形影呢？”真正的艺术远比现实更美，也更能打动人的心灵。当你走到窗前，看见夕阳西下的天空时，你看到的难道不是“一幅很次等的透纳风景画吗”？读到王尔德这篇论文，久被压抑和践踏的艺术与美的观念，在我眼前突然展现绚丽的色彩，显得无比优雅与辉煌，给我以精神上极大的满足。这篇文章对我有如此震撼力，的确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使然，但我也因此与王尔德的文字结缘，从此特别留意他的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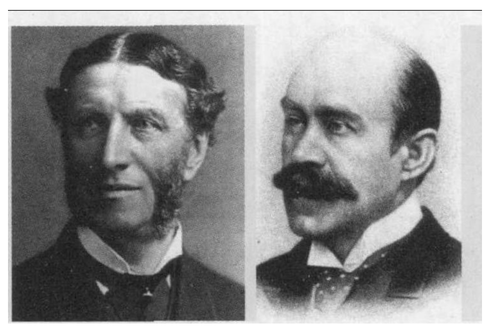
再一次细读王尔德，是在那之后二十余年，即在一九八六年前后。“文革”后我在北大读硕士，留校任教两年后于一九八三年去美



The Decay of Lying
By Oscar Wilde, Oneworld Classics, 2009.11

国，在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哈佛英文系的杰罗姆·巴克利（Jerome Buckley）教授是研究维多利亚时代文学的专家，他退休前最后一次为研究生开课，讲维多利亚时代三位批评家阿诺德（Matthew Arnold）、佩特（Walter Pater）和王尔德。我参加了那个专题课，特别潜心于王尔德的批评理论，从头到尾读了王尔德全部论文、小说《道连·格雷的肖像》以及其他一些文学创作。在这三位批评家中，阿诺德最为有名，佩特也因论文艺复兴的著作而颇有名声，尤其他论达·芬奇所绘蒙娜·丽莎的微笑，更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过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这著名的微笑最初乃是出自佩特的一段文字。王尔德的情形则很不同，他的小说和几部喜剧，甚至为儿童写的童话，都很得读者和观众赞赏，但他的批评文字却一直没有得到学者和批评家们足够的重视。他的文字太俏皮、太漂亮，许多人都欣赏他的语言技巧，却不认真看待其中蕴含的思想。韦勒克写《近代文学批评史》，讲到英国十九世纪唯美派时，就没有提王尔德，只在别处把他轻轻一笔带过。巴克利教授把王尔德与阿诺德、佩特并举，在那时也并不是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可是有在"文革"中读《谎言的衰朽》那难忘的经验，我从来觉得王尔德不仅话说得漂亮，而且其中的道理也很有说服力。我为那门课写的期末论文，题目是"王尔德的批评遗产"（*The Critical Legacy of Oscar Wilde*），就极力认真对待王尔德的批评思想，肯定他所倡言的创造性批评，并把他的观点和当代文学理论相比较，说明他在十九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早已得风气之先，预示了当代理论中的观念和思想。从十八世纪的维柯（Giambattista Vico）到二十世纪许多重要的哲学家、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如伽达默尔（H. G. Gadamer）、弗莱（Northrop Frye）、布鲁姆（Harold Bloom）、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赛义德（Edward Said）以及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等，都能找到与王尔德共鸣相通的思想。然而比较许多爱走极端而语言又晦涩虚玄的后现代主义批评家们，王尔德的文字不仅读起来是一种享受，而且在那些看似惊世骇俗的言辞后面，却往往有相当合乎情理的思想。

如果说《谎言的衰朽》阐述生活模仿艺术，那么在《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这篇论文里，王尔德就提出了另一个相应的观念，那就是艺术模仿批评。如果说透纳的作品教会我们欣赏夕阳西下的美景，那么首先是批评家拉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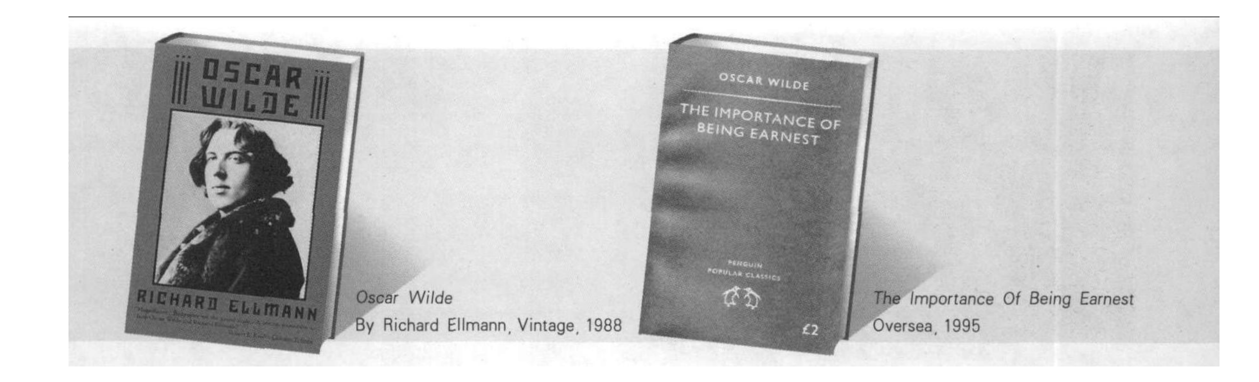


维多利亚时代的批评家
马修·阿诺德（左）和沃尔特·佩特（右）

金（John Ruskin）使我们懂得如何理解透纳的作品；如果说达·芬奇使我们赞美意大利的美女，那也首先是佩特使我们张开了眼睛，得以看见蒙娜·丽莎嘴角那莞尔一笑之美。生活为艺术家提供创作的素材，艺术品也同样为批评家更高的创造提供素材；这两层对应的看法使王尔德的批评理论具有一种系统性和内在的完整。虽然创造性批评的概念一旦发展过度，的确很容易脱离文学和艺术本身，成为过度的诠释，甚至成为理论家和批评家自我陶醉的呓语，走向王尔德所主张的审美批评之反面，但王尔德本人绝非如此。他特别强调批评家必须有真才实学，认为"批评远比创作要求更多的修养"。他更特别强调批评家应该有一种世界主义的开阔胸襟和眼界，能品评各种艺术作品，能真正欣赏艺术之美。

我那篇论文力求从当代批评的角度，重新去评价久被忽略的王尔德的批评理论，认为应该认真看待他提出的那些批评观念，尤其是发掘他的思想与当代批评理论可以相通之处，把王尔德与许多重要的思想家和文学批评家联系起来。在那个时候，这样的看法在英国文学研究中，可以说还颇有些新意。记得那学期有好几位哈佛英文系的研究生选这门课，在最后一堂课结束时，巴克利教授却单单拿出我交的论文，在课堂上念了他给我的评语。他不仅充分肯定了我论文的观点，而且最后一句话说："With a few modifications, this is readily publishable.（只要稍作修改，此文完全可以发表。）"我得到他这样的鼓舞，很快就把论文略作修改，寄给 *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得克萨斯文学语言研究》）杂志，不久就发表在该刊一九八八年春季号上。数年之后，斯坦福大学研究维多利亚文学的列金尼娅·伽格尼尔（Regenia Gagnier）教授编辑一部王尔德评论文集（*Critical Essays on Oscar Wilde*, New York: G. K. Hall, 1991），收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state-of-the-art Wilde criticism*），把我那篇文章也收在文集里。又过了十年，另一位学者梅丽莎·诺克斯（Melissa Knox）出版了《王尔德在一九九〇年代：作为创造者的批评家》（*Oscar Wilde in the 1990s: The Critic as Creator*, Rochester: Camden House, 2001），那本书也从讨论我那篇文章起始。诺克斯指出我的文章最初发表在一九八八年，而在那之前一年刚好出版了理查·艾尔曼（Richard Ellmann）里程碑式的王尔德传记，她认为"这两者都是最早认真看待王尔德的文学批评并发现其价值的论著"。近年来好几位研究王尔德的学者在他们的著作里，还引用或者提到过我那篇论文。

王尔德虽然结过婚，也有家室，但他是同性恋者，这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是非法的事情。他因此在一八九五年被判监禁，两年后出狱，身败名裂，改名换姓流亡法国，终于在一九〇〇年客死巴黎。这也许是值得同情的不幸遭遇，但在我看来，这与王尔德的文学创作和批评思想并没有直接关联。如果不是"文革"那种特殊的政治环境，偶然间读到《谎言的衰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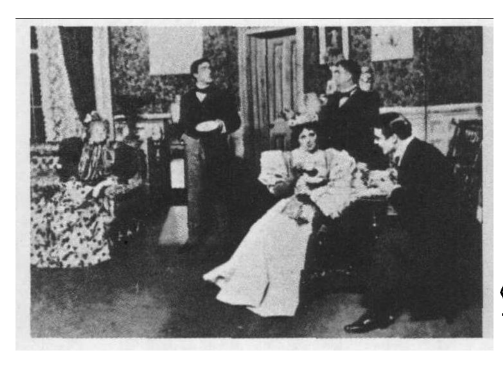


Oscar Wilde
By Richard Ellmann, Vintage, 1988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Oversea, 1995

许不会给我如此震撼，使我那么喜爱王尔德那有时略嫌雕琢的文字。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随着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发展，身份认同的政治和同性恋研究在美国大学里声势越来越浩大，王尔德成为同性恋研究一个热门话题。我从一九八九至一九九八年在加州大学河滨校区（UC Riverside）任教，英文系研究十九世纪文学的专家露丝·阿布罗伯茨（Ruth apRoberts）教授和我是很好的朋友，她给英文系研究生开课，主讲维多利亚时代文学，曾邀我在她的课堂上去讲王尔德的批评理论。那个英文系恰有好几位专门研究同性恋者，露丝事后告诉我说，这些人一开始听说我要去讲王尔德，满以为我会谈论这位唯美派才子的同性恋问题，后来听说我要讲的与此毫不相干，便兴味索然。我给研究生讲课时，他们一个也没有来听。就文学研究而言，这实在很不正常。王尔德是同性恋者，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要讨论此事对王尔德的生活及艺术有什么影响，也未尝不可。但把他的性生活视为唯一重要的事情，好像不谈同性恋，就不能理解王尔德的著作，那就不仅荒唐，而且有碍于读者和研究者真正欣赏王尔德的艺术，深入认识其思想及其价值。歧视同性恋固然是过去时代的偏见，但现在有些研究同性恋者矫枉过正，非要把一个作家或艺术家床笫之间的事视为高于一切，也真是匪夷所思，咄咄怪事。

王尔德只写过一部小说《道连·格雷的肖像》，非常成功，此外他还有好几部喜剧很受欢迎，其中最著名的是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1895)，不仅一直有人在舞台上演出，而且还不止一次改编成电影。著名诗人和翻译家余光中先生把这部喜剧巧妙地译为《不可儿戏》，尽力在译文中表现英文原文的幽默和讥诮，好像和王尔德在比赛造语之妙，颇有意味。二〇〇四年夏，对中西戏剧造诣很深的杨世彭先生采用余光中传神的中译，执导《不可儿戏》，由香港话剧团演出此剧。余光中和杨世彭两位都是熟识的朋友，我在香港观看了《不可儿戏》的首场，通过舞台形式和中文的演出，又一次欣赏了王尔德的艺术。《不可儿戏》可以说最能代表王尔德的人生态度和文字风格，在一八九〇年代英国舞台上的闹剧式作品中，又是一部讥刺意味很强的佳作。王尔德游戏人生的态度在基本剧情上已表露无遗：两个年轻漂亮的女子，居然执意要嫁给名字叫做任真（Ernest）的男人，杰克（Jack）自称任真，最后发现那果然就是他的本名，亚吉能（Algernon）假冒杰克弟弟，结果发现他本来就是杰克的胞弟。这类阴差阳错的巧合在西



《不可儿戏》(*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1895 年演出剧照

方喜剧里早成格套，但王尔德却能化腐朽为神奇，以语言之诙谐巧妙吸引观众，明明无稽荒诞，却让人一时抛开逻辑和常理，心甘情愿随剧情上下去看那可笑的人，可笑的事，可笑的一幕幕情节。其实这剧说不上有什么情节，无非是两对少男少女挑逗调笑，逢场作戏，结尾虽然双双订婚，却很难说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因为王尔德的嘲讽暴露了剧中所有人的空虚浅薄，他们的婚约也显得可笑而不可靠。卖弄风情的关多琳 (Gwendolen) 和狡黠伶俐的西西丽 (Cecily) 为了吊胃口，故作赌气的样子离开杰克和亚吉能，可又在窗口张望，交头接耳地议论，急切地期待两个追逐者来求婚。这两个女人的矫情和两个男人的肤浅，尤其是恶俗霸道而一开口就引人捧腹的巴夫人 (Lady Bracknell)，都是使这出喜剧获得成功的因素，而剧中人物满带机锋的话头，更让人应接不暇，在笑声中体会出一些人生的至理。

在维多利亚时代文坛上，阿诺德主张“诗为生活之批评”，强调文学和文化的社会责任与道德价值。王尔德不赞同这种看法，而自认追随佩特，信奉“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在《道连 · 格雷的肖像》序言里，他明言“世上没有什么道德或不道德的书。书或写得好，或写得糟，如是而已”。他又说：“人的道德生活只是艺术家取材的一部分，而艺术的道德全在于完善使用一种并不完善的工具……对艺术家说来，善恶都不过是艺术的题材。”认真想来，这些话其实不无道理。王尔德正是以艺术家超然的慧眼观察人生世态，揭开习俗礼仪伪饰的面纱，让我们看透世人的虚假，尤其是上流社会的矫揉造作，毫无原则是非。然而这种揭露又并非义正辞严的谴责批判，而是出之于谑浪笑傲、妙语连珠的调侃和嘲讽，并非愤世嫉俗的悲哀，而是深得人生三昧，化为同情理解的微笑。以轻松超然的喜剧观来看世界，而不必处处强调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也许正是《不可儿戏》似乎荒诞、却绝非儿戏的意义。从《谎言的衰朽》到《不可儿戏》，王尔德的语言机智、俏皮，有时故意违反常理而显得荒诞，可是在那荒唐的表面之下，却隐藏着相当敏锐的观察和认真的思考。其实任何好的讽刺都有赖于深刻的思考，而在这个意义上，王尔德可以说是一个思想家，然而是一个极具诗人气质的思想家，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思想家。我认为要真正欣赏王尔德的作品，这就是应该把握的要点。我相信，王尔德作为维多利亚时代一个具有洞察力和深邃思想的批评家之地位，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并将成为十九世纪英国文学研究中一个仍待开拓的发展方向。